



“清”何以變“清”-北朝僧安道壹书刻研究

Lia Wei, Qiang Zhang

► To cite this version:

| Lia Wei, Qiang Zhang. “清”何以變“清”-北朝僧安道壹书刻研究. Shufa yanjiu 书法研究 Chinese Calligraphy Studies, 2020, 1, pp.48-60. <10.19489/j.cnki.1000-6044.2020.01.004>. <hal-04794429>

HAL Id: hal-04794429

<https://hal.science/hal-04794429v1>

Submitted on 20 Nov 2024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清”何以變“清”

——北朝僧安道壹書刻研究之一^[1]

張 強 [比]魏離雅 (Lia Wei)

內容提要：

我們在北朝僧安道壹書刊的11處遺迹之中，均發現了“清”寫刻為“清”的情況。本文梳理了從北齊河清元年（562）到隋開皇十三年（593）31年之中，僧安道壹處心積慮地把“清”字改為“清”，並認為這並非偶然行為。據此可以確認一系列刻石均為僧安道壹的作品，僧安道壹書刻活動比原來人們認為的要後延若干年，直至隋開皇十三年，由此尋求僧安道壹書法及相關研究的新突破。

關鍵詞：

僧安道壹 书刻 河清 清 清 曹植廟碑

DOI:10.19489/j.cnki.1000-6044.2020.01.004

隨着1995年山東東平洪頂山僧安道壹大規模書刊遺迹的發現，一個中國書法史上絕無僅有的人物逐漸顯現出來。他是一個具有獨創性、顛覆性的佛學家與藝術家。由於東平刊刻遺迹的發現，原本無法確認作者的山東泰山經石峪刻經、環東平湖刻經、鄒城五山刻經，兗州、汶上、青州刻經以及河北邯鄲地區的南、北響堂山佛名、佛經的書刊，涉縣中皇山十幾萬字的刻經，現在看來，都與僧安道壹有着密切關係，甚至可以認定，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僧安道壹所為。刊刻作品中“清”代“清”的文字書寫，將僧安道壹的書刊活動向後推了13年。

[1] 2017年6月，筆者出版了《大空王佛——僧安道壹刻經與北朝視覺文化》（文物出版社）一書，之後不久開始僧安道壹的後期研究，已完成或正在進行的相关研究有：《僧安道壹的“在場”方式與書刊風格》，《泰山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唐邕刻經碑為僧安道壹考》，《2018首屆響堂山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曹植廟碑與僧安道壹的古意書體美學系統建構》（待刊）；《章仇氏造像碑：文本選擇與古意書體的初步呈現》（待刊）；《白佛山造像題記研究》（待刊）等。

一、“清”變“清”的歷史線索與具體狀態

古代書法家的書寫自有其特徵與習慣，據這些特徵或可以分析、認定書家是誰。筆者的研究，發現北朝書家僧安道壹的相關書刻中，有一明顯特徵，就是往往以“清”代“清”。迄今為止，筆者在以下僧安道壹書刊遺迹之中，發現了以“清”代“清”的現象：

- 1.《大空王佛》（山東平陰二鼓山），河清元年（562）。
- 2.《法洪銘贊》，（山東東平洪頂山），河清三年（564）。
- 3.《沙丘尼寺題贊》（山東兗州博物館藏），河清三年（564）。
- 4.《“文殊經”篇章》（山東鄒城嶧山），河清三年（564）。
- 5.《“文殊般若”殘碑》（山東曲阜李姓私人收藏）（562—565）。
- 6.《無量義經》（河北邯鄲北響堂山），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568—572）。
- 7.《中皇山刻經》（河北涉縣），天統四年至武平六年（568—575）
- 8.《大集經》（山東鄒城鐵山），大象元年（579）。
- 9.《石頌》（山東鄒城鐵山），大象元年（579）。
- 10.《曹植廟碑》（山東東阿魚山），開皇十三年（593）。
- 11.《白佛山石窟題記》（山東東平白佛山），開皇七年至十年（587—590）。

下面對以上諸刻做梳理分析。

- 1.《大空王佛》（高581、寬122釐米）

二鼓山“大空王佛”刻石，位於山東省平陰縣洪範鎮二鼓山，1996年前後被發現。最早出現在僧安道壹刻經遺迹中的年號，是在大字“大空王佛”左上角題款上的“大齊河清元年造”（圖1），《中國佛教石經》^[2]中，將僧安道壹所書的“河清元年”確定為“河清元年”。值得注意的是，二鼓山的“大空王佛”下面，有“僧安一”的簽名，這也是目前發現最早的有“僧安道壹”署名的刻石。

《中國佛教石經》列出了“原狀錄文”，即照實記錄原內容。列出的“隸定”，實際也是“厘定”，即經過反復斟酌後對於古代文字的確定。然而，僧安道壹此處所書寫的



圖1

[2] 王永波、雷德侯主編《中國佛教石經》第一卷，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357頁。



圖2

了四點水（圖2）。

這個“大齊河清”年號也同樣被《中國佛教石經》一書誤錄、誤定與忽視。

3.《沙丘尼寺題贊》

1992年底在兗州南大橋西發現，1994年由山東曲阜李姓古玩商捐獻山東兗州博物館。《沙丘尼寺題贊》中，僧安道壹不僅在年號上用了“清”字，而且在內文之中所提到的“三空明澈，六度凝清”這樣的句式之中，也把“清澈”的“清”換為具有“冬暖夏涼”涵義的“清”。（圖3、圖4）

4.《“文殊經”篇章》（高148、寬224釐米）

《文殊經篇章》刻石位于山東省鄒城市嶧山五華峰頂，發現于1986年3

“大齊河清”還是被《中國佛教石經》生硬地改為
“大齊河清”。

2.《法洪銘贊》（高215、寬142釐米）

洪頂山位于山東省東平縣屯鋪村東北約2公里處。2015年發現，分為南壁與北壁兩大部分，北壁有14處，南壁有5處。《法洪銘贊》位于南壁東端，有界格，隸書9行，行16字，共138字，字徑0.13米。^[3]

二鼓山“大空王佛”刊刻兩年後，在大面積的書刊作品之中，僧安道壹還是非常謹慎的，畢竟是皇廷年號，所以在洪頂山書刊《法洪銘贊》的時候，以“清”代“清”之後，又在“清”字下面加

[3] 參考賴非《山東北朝佛教摩崖刻經調查與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圖3



圖4



圖5



圖6



圖7

月，在“光風霽月”大字刻石的下面。上刻題名1行11字，經文7行，共98字，字徑15釐米，已剥蝕23字，完整者75字。其中的“河清三年”也採用了“清”字。（圖5）這個“清”字，故意採用了借旁式的模糊手段。此處“大齊河清”的年號也同樣被《中國佛教石經》^[4]一書誤錄、誤定。

[4] 王永波、溫狄婭主編《中國佛教石經》第二卷，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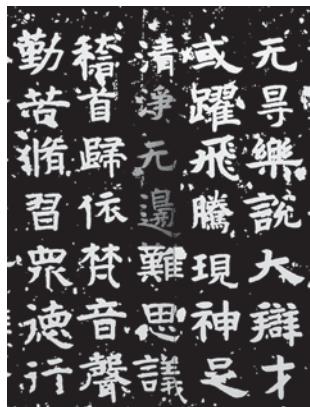


圖8



圖9



圖10

5. 《“文殊般若”殘碑》(高50、寬23釐米)

“大齊河清”刻經殘石，單字為 13×11 釐米。2015年7月9日，筆者在青州一家古玩店購得這塊刻經殘石拓本（圖6）。2017年5月18日，筆者在杭州轉塘文物店見到來自山東曲阜的李姓古玩商手中原石，并現場拍攝了原石圖片（圖7）。李姓古玩商言其2010年在曲阜江北古玩城發現并購藏，出土地在濰坊地區，青州古玩商則指認該石出土于濰坊青州黨校附近。這塊刻經殘石為雙面刻石，一面為年號落款，另一面為經石題目“文殊般若”四字。或許是為了減輕人們對於減筆的關注度，“大齊河清”之“清”的兩點，僧安道壹採用“篆書”，如同“鐵山刻經”中“次”的處理一樣。

6. 《無量義經》

北響堂寺刻經洞位于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區最南端，為三壁三龕式佛殿窟，其外觀為單體覆鉢塔式。窟分前後室，在後室前壁拱門的兩側壁刻有蕭齊曇摩伽陀耶舍翻譯的《無量義經·德行品》。右壁刻16行，行21字；左側刻18行，行21字。字徑寸五分。在這裏，共出現了三個“清”字，其中，一個被寫為“清”，兩個是正常的“清”（圖8、圖9、圖10）。它與涉縣中皇山的刻經情況類似。

在《響堂山石窟碑刻題記總錄》^[5]中的《無量義經》“錄文”部分，對於僧安道壹所書刊的“清”採取了無視態度，均標改為“清”。

7. 《中皇山刻經》

牛永芳詳細記載了河北涉縣中皇山刻經情況：“涉縣中皇山摩崖刻經分

[5] 張林堂、許培蘭《響堂山石窟碑刻題記總錄》，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頁。



圖11



圖12



圖13

布在兩座石窟和四處露天摩崖上，總面積為165平方米，共刻佛經六部，經文十三萬四千七百餘字。按照刻經的書寫和鐫刻順序，自媧皇閣（梳妝樓背後）向左，六部經文自南向北依次是《思益梵天所問經》《十地經》《佛垂般涅略說教戒經》（簡稱《佛說教戒經》）《佛說盂蘭盆經》《深密解脫經》《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6]

《中皇山刻經》大多為僧安道壹親自書刊。首先我們要將中皇山刻經的偶然性加以排除，以《涉縣北齊刻經》編排體例為分析對象，我們要檢測的是，在約占百分之十的非僧安刻經部分，“清”使用如何。馬忠理、張沅、程躍峰、江漢卿《涉縣中皇山北齊佛教摩崖刻經調查》一文第24頁—96頁範圍內，有三個三點水偏旁的“清”字，沒有發現任何一個“清”。如該文中統計的：

“……這壁刻經殘存總寬為12.85、高4.55米……下部經文殘蝕較重，上部經文被厚1釐米的水鏽所覆蓋。現殘存經文348行，滿行120字。從第308行以後至348行的40行不隔行，緊接刻的第二部經文首品。從殘存的第一行至120行為隸書體……字徑2.5釐米左右。從121行到308行，改為楷隸兼備的魏體字。”^[7]

中皇山隸書字體（其他書刊者）的“清”，沒有任何缺“點”的“清”字出現。我們繼續檢索統計，共發現了“清”字65個，“清”字15個，磨泐不清的9字。

[6] 牛永芳《涉縣中皇山摩崖刻經述略》，《中國書法》（書學）2016年第12期，第193—195頁。

[7] 馬忠理、張沅、程躍峰、江漢卿《涉縣中皇山北齊佛教摩崖刻經調查》，《文物》1995年第5期，第67頁。



圖14



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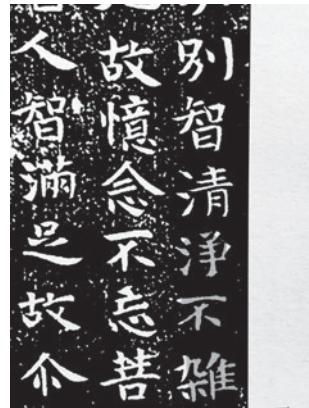


圖16

“清”的使用

第一部分，梳妝樓，《思益梵天所問經》：此部分共出現以“清”代“清”字17處，此處僅舉1例，其餘從略（圖11）。

第二部分，眼光洞，《十地經》：“分刻在三處共七壁，即第一號刻經末，不隔行接刻在摩崖，又轉入中洞三壁，及北洞的二壁半刻整部經文。”^[8]此部分共出現以“清”代“清”字22處，此處僅舉1例，其餘從略（圖12）。

第三部分，蠶姑洞，《十地經》：此部分共出現以“清”代“清”字11處，此處僅舉1例，其餘從略（圖13）。

第四部分，山門，《深密解脫經》：“分刻在二處摩崖，第1—7品經文，位于北洞外力士大龕之北……《深密解脫經》的8—11品經文，是緊接山梁南摩崖刻經的第1—7品經文，兩壁共刻241行，合計3.2萬字。”^[9]此部分共出現以“清”代“清”字15處，此處僅舉1例，其餘從略（圖14）。

“清”的使用

第一部分，梳妝樓。《思益梵天所問經》《十地經首品》：此部分共出現正常“清”字4處，此處僅舉1例，其餘從略（圖15）。梳妝樓。《十地經》：此部分共出現正常“清”字2處，此處僅舉1例，其餘從略（圖16）。

第二部分，眼光洞。《十地經》：此部分共出現正常“清”字2處，此處僅舉1例，其餘從略（圖略）。

第三部分，蠶姑洞。《十地經》：此部分共出現正常“清”字6處，此處

[8] 馬忠理、張沅、程躍峰、江漢卿《涉縣中皇山北齊佛教摩崖刻經調查》，第68頁。

[9] 同上，第73頁。



圖17



圖18



圖19

僅舉1例，其餘從略（圖略）。

第四部分，山門，《深密解脫經》：此部分共出現正常“清”字1處，此處舉1例（圖略）。

無法辨識的“清”或“清”

第一部分，梳妝樓，《思益梵天所問經》《十地經首品》：此處共出現“清”“清”不辨1處。

第二部分，眼光洞，《十地經》：此處共出現“清”“清”不辨3處。

第三部分，蠶姑洞，《十地經》：此處共出現“清”“清”不辨2處。

第四部分，山門，《深密解脫經》：此處共出現“清”“清”不辨3處。

8.《大集經》(高3470、寬1380釐米)

北周大象元年(579)書刊，位於鄆縣城西北部，鐵山之陽。摩崖南北長61米，東西寬17米，為一約45度斜坡的巨大花崗岩石坪，總面積1037平方米。佛經刻字位于刻面右部，係石刻主要部分，共刻《大集經》文17行，行50—60字，原刻946字，部分風化剥落，現存699字，字徑長40—50釐米、寬40—60釐米。書體以隸書為主，間用篆勢，雜以行草，用筆方圓兼施。經文上方有陰線刻巨龍、祥雲、佛光圖案，其下刻龜背紋圖案，若隱若現。其中出現了三處



圖20



圖21



圖22



圖23

以“清”代“清”字（圖17、圖18、圖19）。這部分佛經文字的厘定中，《中國佛教石經》^[10]總算是遵照了僧安道壹的意思，全部是按照“清”來確定的。

9.《石頌》（高1700、寬400釐米）

其位置、環境、所在石坪等均與《大集經》同。

《石頌》文字在刻石左部，上端刻“石頌”兩個大字，字寬70—95釐米、高80釐米。下端刻頌文小字，共12行，行52—55字，計600餘字。第四行有“皇周大象元年歲大淵獻八月庚申朔十七日丙子”記時文字。石頌之中的“清駁”（或爲“青駁”），被僧安道壹改寫爲“清駁”。（圖20）

10.《曹植廟碑》（高247、寬103釐米）

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山東省志》如此介紹曹植墓：“曹植墓位于東阿魚山西麓……開皇十三年（593）立曹植墓碑。碑圓首方趺，趺坐半入土中，高度不詳。碑冠與碑身爲整石雕出。通首高2.47米，寬1.03米，厚0.21米，碑首雕而不起龕，起龕有三身像。碑身高1.80米，鐫文22行，行42—44字不等，共935字。書雜篆隸楷三體，結體險峻，氣韵高邁，筆力雄奇。此碑早年湮沒在大清河中，清代撈出，還置墓前。此外尚有題詠、記事碑碣4方。”^[11]

[10] 王永波、溫狄婭主編《中國佛教石經》第二卷，第129頁。

[11] 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山東省志·文物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76頁。

《曹植廟碑》中也出現了以“清”代“濁”的情況。（圖21）從碑文上下文來看，“清雅自得”的含義，顯然是與“濁”“俗”“隨波逐流”相反的意思。所以，在這裏沒有任何理由來使用“清”，但是，僧安道壹（筆者認為其所作）還是用了“清”。《金石索》^[12]的作者倒是能够真實地隸定《曹植廟碑》的“清”字。《曹植廟碑》還使用了篆書的“清”（圖22）。

11.《白佛山石窟題記》

“白佛山（又名危山、金螺山），位於山東省東平縣須城鄉焦村北1公里。石窟雕造在山之陽海拔200米處……殘留有‘大隋開皇七年寺主王子華’‘大隋開皇十年歲次□□□□□敬造阿彌陀像一區上為皇帝陛下□□□一切有影□□□同沾斯慶’等字樣。”^[13]這篇考古報告的粗疏是顯而易見的，不僅沒有錄全題記的內容（現今保存完好），而且也沒有寫明題記的內容與數量（筆者將專文探討）。

《白佛山王子華題記》所署年款為大隋開皇七年（587），白佛山石窟外壁左面摩崖上的《曇獻題記》為開皇十年（590）。

石壁上供養人的題記，“姚清娘”的“清”字被書刊為“清”。（圖23）人名謬誤，很容易被認真而虔誠的出資者發現。因此，僧安道壹被要求補上一個“點”，所以有了現在的“清”字中間一點，脫離了本字。而另外兩個名字“嚴清”“呂清女”，僧安道壹沒有理由再寫成“清”了。這個修補性的改正，恰恰證明了他在書刊中試圖改寫“清”的動機。

二、“清”的使用所帶來的涵義變化

（一）一般意義上的“減筆”現象

在書法史上，對於某些字的“改變”，似乎是書法家的“特權”，不過，這種改變，是針對特定漢字使用的。清初徐樹丕（？—1683）指出這些特定字祇有五字：

書家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冲”“涼”“減”“況”“決”五字，悉以三點作二點，士人札翰皆然。《玉篇》正收入于水部中，而之末亦存之，而皆注曰：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因爲訛。”^[14]

[12] [清]馮雲鵬、馮雲鵬編著《金石索》，臺聯國風出版社，1983版。

[13] 泰安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山東東平白佛山石窟造像調查》，《考古》1989年第3期，第231頁。

[14] [清]徐樹丕《識小錄》卷三，轉引自《歷代筆記書論彙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7頁。

我們以《康熙字典》釋義，具體考察了以上五个可以“俗”寫的字之通行意義。考察得知，以上五字“丂”與“冂”之間可以在書寫過程中轉換，而不會影響到其意義。而另外一些字如果出現增減筆畫會如何呢？

（二）“清”變為“清”：在年號之中意義改變

僧安道壹在書刻中將“清”改做“清”，是不是其書寫習慣所致的偶然結果呢？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清”與“清”本來就是兩個字。其所書刻“清”多為年號，改做“清”的話已經改變了年號的“本意”了，僧安道壹明白他這麼做所面臨的風險。最初“改變年號”的行為之中，僧安道壹在為其師友書刊《法洪銘贊》時，減筆“清”下面加上四點水；在河清刻經殘石中，則將“清”的兩點以篆書形式表現。

“大齊河清”年號的由來，是出自當時青州刺史的一封上表，其中提到，黃河在某個月份變清，因此，北齊王朝改“大寧二年為河清元年”。^[15]

“清”字的本意，我們可以從文獻之中查到。

清：

《康熙字典》：《說文》曰：寒也……《玉篇》：冷也。^[16]

《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溫以御其寒，清以致其涼。《注》：定，安其床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釋文》：清，冰冷也……”^[17]

可知“清”主要是清涼、寒冷之意。特別是“清”含義中涉及“冬天予父母以溫暖，夏天予父母以涼爽”，其中，“清”之于孝道的喻示，很可能是僧安道壹變“清”為“清”的重要意圖所在。

清：

“清”的含義主要有：水清；清潔、潔淨、純潔；清明；清涼；清雅高尚、清白、清正；與“濁”相對等義。

我們推論：“清”字的大量使用，最大可能是，僧安道壹在562年徹底出家、脫離了俗世之後，出于對父母的懷戀與歉疚之情，于是在其書法刊刻中，以“清”代“清”，以求“清”字“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之義。

[15] 《北齊書》卷七·帝紀第七，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90頁。

[16] 《康熙字典》子集下·冂部·二至八畫·一〇，中華書局，1958年版。

[17] [清]朱彬撰《禮記訓纂》，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0頁。

三、“清”替代“清”的意義

(一) 公認僧安道壹活動時間表被改寫

日本學者桐谷徵一《北齊大沙門安道壹刻經事迹》^[18]一文認為：579年僧安道壹終結刻經生涯。北島信一確認580年僧安道壹圓寂（63歲）：“581年隋朝建立。鐵山石頌題額，葛山、崗山《如楞伽經》未竟。”^[19]賴非在《精跨義誕，妙越英繇——榜書至聖僧安道壹》一文中認為580年僧安道壹60餘歲時終結其刻經生涯。^[20]國內外其他學者基本持以上觀點，且普遍認為僧安道壹的活動時間在562—579年間，即北齊河清元年到北周大象元年之間。但如果算到（隋代）593年的《曹植廟碑》，則其有30年餘的書刊活動，且活到70多歲，而非63歲。

(二) 僧安道壹部分未署名作品得到確認

《大空王佛》，河清元年（562）

雖然已經有了僧安道壹的署名，“清”的寫法等於二次認定。它同時也成為我們本文命題的起點：“清”確實是僧安道壹所為。

《法洪銘贊》，河清三年（564）

公認為僧安道壹作品，此作中“大齊河清三年歲月實沉”與《沙丘尼寺題贊》署款相呼應，其“清”也可以看做是二次認定。

《沙丘尼寺題贊》，河清三年（564）

此刻石之中有與洪頂山完全一致的“大齊河清三年歲月實沉”落款，可以據此斷定是僧安道壹所為，改寫“清”，真正把時間落到實處。

《“文殊經”篇章》，河清三年（564），《“文殊般若”殘碑》（562—565）

從書刊風格以及所選擇的文殊經篇章而言，可以斷定是僧安道壹所為，“清”字的改寫將時間落到實處。

《無量義經》，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568—572）

確定北饗堂《無量義經》為僧安道壹遺迹的意義在於，以往僅憑“大空王佛”的題記，來推斷為“僧安道壹”的符號標識，但畢竟還是無法證明是其親為。此作確證後，北饗堂的相似作品也可以確認，尤其是《唐邕刻經碑》曾長期被誤認為是唐邕書刊。

[18] 焦德森主編《山東摩崖刻經研究》續，天馬圖書公司，2003年版，第45頁。

[19] [日]北島信一《彩色石壁摩崖刻經論及其年代考》，焦德森主編《山東摩崖刻經研究》三，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頁。

[20] 郭雲策編《僧安道壹刻經全集》，山東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9頁。

《中皇山刻經》，天統四年至武平六年（568—575）

以往對於中皇山刻經中十幾萬字的僧安“刻經體”，祇是在相似度上比較，而“清”的寫法，則可以確證為僧安道壹書刻。

《大集經》《石頌》，大象元年（579）

雖然已經有了僧安道壹的署經，但是，一處“清涼”，兩處“清淨”的改寫等於二次認定。

《曹植廟碑》，開皇十三年（593）

這塊沒有作者而又名聲顯赫的碑，常被任意地解讀，如今可以確證為僧安道壹的作品，這給人以下思考：

一是，僧安道壹的書法除了在北朝語境之中被討論，如今可以納入隋朝書法史語境中加以重新認知。

二是，與《曹植廟碑》具有共同書體美學特徵的、山東汶上中都博物館所藏開皇九年（589）《章仇氏造像殘碑》，也可以納入僧安道壹書法體系之中加以討論。

三是，《曹植廟碑》將被重估其在書法史上的價值。以往人們祇是從文人趣味上來貶斥《曹植廟碑》，而顛覆文人趣味一直是僧安道壹書法觀的一個取向。

《白佛山石窟題記》，開皇七年至十年（587—590）

此石窟中造像題記涉及299人，外加兩個摩崖造像窟紀年題記，如此豐富的書法遺存，其作者大多能得到確認。

結語

以上梳理了從北齊河清元年（562）到隋開皇十三年（593）31年之中，僧安道壹處心積慮地把“清”字改為“清”的情況，本文認為這並非偶然行為。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就此確認一系列刻石均為僧安道壹的作品，僧安道壹書刻活動比原來人們認為的要後延若干年，至少到隋開皇十三年（593）。

張 強：四川美術學院世界實驗書法高等研究中心

魏離雅：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

（編輯：王曉光）